

重建 工人权力

与雇主相比，美国工人的权力受到了系统性的削弱，这抑制了美国工人工资的增长

劳伦斯·米舍尔



美国两大政党的政客们现在都承认美国工资停滞不前，且都以“系统被操纵”的说辞搪塞这一问题。有些政客关注的焦点是移民数量，以及他们所认为的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而有些则关注提高物价并赚取巨额利润的垄断企业。但是，在谁以何种方式操纵了系统这一问题上，政客们却未达成共识。

事实上，正如我与同事乔希·比文斯 (Josh Bivens) 和海迪·希尔霍尔茨 (Heidi Shierholz) 合著且于最近发表的《工资压迫原因分析》一文所述，美国工资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实践和经济政策 (或是由于商界和富裕阶层阻挠了相关改革) 导致工人权力被系统性削弱。由于工人无法享受应有的权力，造成工资被压低，工资不平等上升，种族不平等也有所加剧。导致工人权力丧失的具体机制在于过度失业、全球化、劳工标准下降及执行不力、集体谈判能力削弱、公司结构变化使工人处于不利地位等。要重建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工资增长模式，首先需要以重建工人权力为中心的新政策。

过去 40 年中，最富有的 1% 和 0.1% 人群的收入分别暴增了 158% 和 341%。尽管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提高了近 70%，但普通工人的时薪却只增加了不到 12%。自 2000 年以来，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

下述政策和企业实践全面削弱了大多数工人的议价能力，其累积效应是导致前述工资模式和经济结果的主要原因。

紧缩性政策

货币、财政和贸易政策导致了“过度失业” (定义为失业率高于充分就业率)。自 1979 年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制定者一直担心通胀风险，他们并未拥抱充分就业带来的好处。这种做法造成了过度失业，对中底薪工人带来了严重伤害，尤其是非裔工人。

如果美国在 1979 年至 2007 年期间能保持 5% 的充分就业，则到 2007 年工资中位数将提高至

18% 到 28% (Bivens 和 Zipperer, 2018 年)。联邦和州政府实施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导致了大衰退，使失业率在此后长期高居不下，其带来的侵蚀效应使工资问题雪上加霜。仅过度失业这一个因素，就导致自 1979 年以来非裔工人与白人工人的工资差距扩大了 9 个百分点。

资本全球化

旨在最大程度地抑制工资的蓄意政策推动了全球化趋势，给非裔和拉丁裔工人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比文斯 (Bivens) 2013 年的研究表明，与低薪国家的贸易往来使未接受大学教育的美国工人薪资下降了约 5.6%——相当于人均每年损失近 2000 美元。其他研究也证明了该结论。

仅由贸易伙伴的技术变革和政治变革驱动的全局化，终究会抑制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但美国的政策失误进一步加剧了此类破坏性影响：未能给失败者提供合理的补偿，也未能提高其国内议价能力；未能解决导致巨额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的汇率失调问题；通过了保护企业利润却削弱工人经济影响力的贸易协议。这导致美国雇主用进口商品替代了以前由美国工人制造的产品。

工会遭到削弱

确定中等收入工人工资的关键机制是集体谈判，因此工会代表权的削弱一直是抑制男性中等收入工资增长的主要原因 (他们加入工会的比例远低于女性)。集体谈判会带来更平等的工资结果，而工资下降会导致不平等加剧，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表的学术文献中已明确论证了该观点。福汀 (Fortin)、勒米厄 (Lemieux) 和劳埃德 (Lloyd) (2019 年) 指出，工会被削弱可以解释男性工资不平等上升的 29%-37%，能够解释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男性之间的不断扩大工资差距的 37%，这意味着，工会被削弱导致男性工资中位数每年下降 0.33%。工会被削弱对女性工资不平等的影响较小，其能解释 10%——13% 的整体工资不平等的增加，以



及13%的高收入女性的工资不平等的增加。

私人部门工会覆盖率不断下降(从1979年的约23%下降到2019年的仅7%),主要是因为企业实践和法律判决的变化,它们削弱了工人组建工会和开展议价的能力。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集体谈判的巨大需求并未得到满足:2017年,近一半的非工会工人希望进行集体谈判,这涉及5800万未被代表的工人。

劳工标准下降

劳工标准及其执行在多方面受到削弱,这也抑制了工资增长。

美国在维持适当最低工资标准方面的大溃败,降低了最底层1/3劳动者的收入,严重影响了非洲裔、西班牙裔和女性劳动者。尽管生产力翻了一番,但2019年联邦最低工资比1968年的峰值低了近25%。最低工资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低薪工人之间工资差距的变化。

此外,加班保护也被削弱。1975年,近一半的工薪族满足加班费的门槛(低于一定门槛的工薪族可自动获得加班费),而到2014年,该比例骤降至10%。

削弱劳工标准的实施力度的下降,可能会导致工人工资被企业窃取,这使工资问题雪上加霜(如果雇主未向工人支付其应得报酬,支付金额低于最低工资水平,或是未支付加班费,工人工资就被企业盗取了)。2016年,低薪工人因此损失了5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了抢劫案中被盗财产的损失。工资盗窃在低薪和移民工人中尤其严重,约占最底层60%劳动者总工资的3%。我们无法估算过去40年来遭到窃取的工资总量,但专家认为这种现象目前非常普遍——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与1979年相比,因工资盗窃行为导致的工资损失增加了1.5%-2%。

移民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劳工标准真空区。约6%的劳动力包括无证工人和外来工人)因雇主适用其市场权力,而无法得到全面的劳动

保护。这些受剥削的移民劳动力的增长,既削弱了美国的工资和就业标准,又对工资构成下行压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表明移民工人抢走了别人的工作,问题的关键是劳工标准和保护措施薄弱,导致移民工人更易受到剥削。

此外,雇主还制定新的协议(工人不得不签署),其限制了工人的就业前景及其向法庭和政府机构投诉雇主的权力。具体而言,此类协议按照雇主的意愿肆意压低工资。例如,竞业协议禁止员工去竞争对手的企业工作,导致28%-46%的私人部门员工就业前景黯淡。强制性仲裁条款迫使工人以个人身份(而非集体诉讼的一部分)对歧视指控、违反工资和工时法以及其他事项进行由企业主导的仲裁,使他们无法诉诸法庭。2018年,56%的非工会私人部门工人受此类协议的约束。

数百万工人被蓄意误判为独立承包商(实际上是雇员),因此剥夺了他们享受社会保险保护、工作场所保护(反歧视、集体谈判)以及医疗和养老金福利等权利。不仅是Lyft和Uber等创新型打车平台领域的劳动者,公路运输、建筑和清洁卫生等服务领域的工人也普遍受到此类不平等约束。

企业结构

企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企业之间以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和收入。

雇主影响劳动力市场表现、使之利于自身的最明显方法,是所谓的“断裂”。“断裂”是指占支配地位的企业通过标准和其他机制,对价格和结果进行严格控制的一种国内外包做法。在该过程中,利润重新分配给占支配地位的企业,分包企业的工资和工作环境遭到进一步侵蚀。在美国经济中,1/5到1/3存在“断裂”特征,这一比例远高于40年前(当时可能仅为现在的一半)。为确定“断裂”的影响力,我们制定了推测性衡量标准:如果将15%的就业岗位转移至工资低15%

的“断裂”企业，则整体工资将下降 2.25%。

大公司因此进一步要求供应商提供更低的报价。威尔默斯 (Wilmers, 2018) 对占支配地位的采购商挤压供应商利润和降低工资的能力进行了量化研究。非金融供应商通过占支配地位采购商获得的收入份额从 1979 年的 5% 增长至 2014 年的 19%，其中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份额从 6% 增长至 26%。威尔默斯估计，该情况导致非金融类公共公司的年收入下降了 3.4%，对中低收入工人的影响肯定更大。

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国会解除了对航空公司、卡车运输、州际巴士、电信、公用事业和铁路的管制，从而降低了蓝领工人的薪酬。20 世纪 80 年代，9% 的劳动力受到行业解除管制的影响，这削弱了中等收入劳动者的工作岗位，使其薪资大幅降低，也可以解释 1979 年至 1988 年期间男性工资不平等上升近 7% 的原因。

垄断（由少数销售商主导产品市场）和雇主集中（由少数雇主主导就业市场）都会导致工资下降，但此类因素并不会显著抑制工资的增长。

雇主集中主要影响农村地区，但在过去 40 年里似乎没有增长。劳动力收入的占比下降，但不那么明显的是：这是垄断利润的结果，而非工人权力被削弱导致的。最近经济复苏期间，随着失业率下降，劳动力收入的占比明显上升，这证明受侵蚀的工人权力的作用很大，因为垄断程度并不一定会随着失业率的降低而下降。五大科技公司的巨额利润确实表明垄断问题的严重性，但其在抑制工资中的作用很难评估，且尚未得到探讨。

前路漫漫

只有制定并落实以恢复普通工人议价能力为核心的政策，才能让大多数人从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受益。确保低失业率，提供适当的劳工标准，包括落实探亲假、病假和其他政策。有效执行相

关法律，通过消除强制性仲裁和竞业协议，赋予工人选择权。重建起集体谈判能力。这些政策不仅将重建公平的经济环境，还将促进公民参与民主，并促进工作场所内外的自由。

美国工人的权力被系统性地剥夺了，导致美国工资停滞不前。

几十年来，许多经济专家的传统观点认为，过去 40 年工资停滞不前不过是经济进步（如全球化和自动化）的不幸副产品，这种观点使精英阶层并无些许不安。20 年来，人们一直未能对自动化的初步理由予以说明：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持续下降，自动化的速度处于历史低位。人们本可以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全球化。此外，这种自我安慰的论断很容易忽略了高管和收入最高的 1% 群体收入增长的情况，而此类增长并非源于他们的特殊技能或自动化。美国两大政党的政策辩论已完全超出了“自动化驱动的技能赤字”的说法，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政治和政策将决定工人能否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公平的份额。FD

劳伦斯·米舍尔 (LAWRENCE MISHEL) 是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参考文献：

- Bivens, Josh. 2013. "Using Standard Models to Benchmark the Costs of Globalization for American Workers without a College Degre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riefing Paper 354, Washington, DC.
- Bivens, Josh, and Ben Zipperer. 2018. "The Importance of Locking in Full Employment for the Long Haul."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report, Washington, DC.
- Fortin, Nicole M., Thomas Lemieux, and Neil Lloyd. 2019.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ages: The Role of Spillover Effects." Vancouver School of Economics conference pap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Mishel, Lawrence, Josh Bivens, and Heidi Shierholz. Forthcoming. "Explaining Wage Suppression."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 Wilmers, Nathan. 2018. "Wage Stagnation and Buyer Power: How Buyer-Supplier Relations Affect U.S. Workers' Wages, 1978 to 2014."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3 (2): 213-42.